



故乡娄烦大量种植山药蛋,这里的山药蛋沙面好吃,这个晋西北高原的特产,总是让我魂牵梦绕。

小时候秋天到来时,上学的我们也恰好放假,便跟着母亲到地里帮着收山药蛋。那景象何等壮观啊!山丘像金沙漫过,流动着的“金沙”上,到处是抢收的人们。山药茎叶已经枯萎,枯萎的根部出现隆起和裂口,顺着裂口,掀开泥土,一定会摸到山药蛋。男人们用镢头在前边刨,女人们挽着篮子跟在后边捡,把一颗颗白的、黄的、紫红的山药蛋从土里掏出来,放进篮里,再倒在一堆,堆起一座小山包。

后来,弟弟出生那年,由于遭灾,山药蛋少了,我们的生活相当困难,每天只能以野菜伴些许小米充饥。母亲奶汁少了,弟弟饿得嗷嗷大哭。看着这般情景,我流着泪问母亲:“娘,你说为啥山药蛋少了呢?”母亲摸着我的头,哽咽着说:“孩子,好好念书吧!”看着母亲红肿的眼睛,看着弟弟消瘦的小脸,我心里说不出的难受。一天放学后,我把书放在教室里,提着空书包跑上了山岭。在一片刚收完的山药蛋地里,使劲用两只小手不停地挖着每个空坑,希望能有一颗硕大的山药蛋滚出。我挖呀挖呀,忽然,发现一个小坑里,有一根毛发般细小的根茎,向远处的泥土延伸。顺着这根希望的“小金丝”,我慢慢地挖着,手指突然碰到一个硬块,我小心地把上面的泥土剥去:啊,一颗白白的、嫩嫩的、如拳头大小的

山药蛋暴露在我的面前。我没有立刻把它放进书包里,而是细细地端详着,看它上面的每一个隆起和每一处凹陷,以及它的形状和在泥土中的位置……

我没有停,一直挖了满满一书包山药蛋,提回家。母亲用颤抖的双手抱住我渗出血的小手,“哇”地一声放在自己口里。母亲做了一顿山药蛋饭,我看着弟弟一口一口香甜地吞咽着棉花似的山药肉,心里甭提多高兴了!

农村实行大集体时,庄稼由生产队统一种植,打下的粮食再分到各家各户,每年粮食都不够吃,要再挖点野菜补充。每到夏秋季节,粮食所剩无几,只有少许几篮发了芽的山药蛋。母亲每天劳动回来,总要挖回一篮野菜,把野菜洗净切碎放入锅里,再加几块山药蛋,便是中午饭了。那野菜叫“杨菊菊”,吃在嘴里,苦涩难忍,嚼半天才能下咽。每次吃饭,第一碗有山药蛋的盛给父亲,父亲是家里唯一的劳动力,必须吃饱。接下来是孩子们的,山药蛋少了点。轮到母亲时,锅里只有野菜了,但母亲一声不吭,默默坐在厨房的地上,慢慢嚼着苦苦的野菜,不时还要夹几筷子扔给地上觅食的小鸡。

后来,老百姓的生活渐渐好了起来,山药蛋不仅能够满足自家吃,还能卖到外面。我参加工作后,住在城里,每年厨房里总要备几袋山药蛋。即便到饭店吃饭,也首先要点一道山药蛋的菜。每天不吃山药蛋,就觉得肚里没饱似的。

父母已年逾古稀,年轻时受过太多的

苦。休息以后,儿孙们总想让他们过得好一些,常常到超市买些好吃的,也从外地让人捎回稀罕水果、高档点心。可他们却放着不吃,或者给了邻居的小孩,每天仍然要吃山药蛋。遇此情况,儿孙们总要规劝。母亲说:“山药蛋好吃、养人,已经习惯了,总也吃不腻的。”大家不服气,还在争辩,还在劝说,但我同意母亲的说法。

说到山药蛋的吃法,那真是数不清。油焖土豆、土豆炖排骨、土豆烧牛肉、油炸土豆泥等等,都非常好吃。但深埋在记忆中的还是儿时的吃法较多。常常在双休日下厨,变着花样儿做着吃。比如“炖烩菜”就常做。将山药蛋切成块,辅之以粉条、豆腐、金针、海带,炖在一起,起锅前将小炒肉在上面一浇,香喷喷,热腾腾,着实好吃。还有“磨擦擦”,将山药蛋皮刮净后,放在打有小铁碴的铁皮上,来回转圈磨,然后在磨下的碎末里加入面粉,再捏成一些小块,放在蒸笼里蒸。蒸熟后,揭开锅盖一看:嘿,满笼里像放着一件件精致的工艺品,闪着青光,散发着清香,把它们放在碗里,加些盐醋等调味品,递进口里一嚼,绵软细滑,简直是天下一道好菜。

山药蛋是山里人的主食,又是城里人的配餐。走在城里的街上,发现开了不少的粗粮馆、土豆馆,那些吃腻了大鱼大肉的人们,也纷纷前来品尝。市场里贩卖山药蛋的商家也不少,既赚了钱,又帮农民找到了销路。据说,山药蛋有降脂、美容的作用,是养生的上好绿色食品。

本版投稿邮箱:symtywb@126.com 图片来源:百度网

家在太原

钟楼街记忆

晓 根

上世纪80年代,我住在新建路28号大院,人们叫它省直农口大院,住了有七八年时间。单位省气象局就在新建路羊市街口对面,离宿舍近,去钟楼街很是方便。穿过羊市街一路向东,过了宽银幕,再过解放路十字路口,钟楼街就到了。

钟楼街是太原市历史悠久的繁华街市,商场毗连,店铺林立,小到针头线脑,大到家具家电,无论是剃头制衣,还是喝酒吃饭,应有尽有。

我曾在按司街上剃过头,在华泰厚店里做过衣服。吃元宵去老鼠窟,买闹钟上亨得利。在开化市买过自行车,在大中市买过圆桌、电镀折叠椅。拍照去过街东头的开明照相馆,买邮票、寄信去过西头的邮电局,小饭店里吃过炸酱面,上海饭店的包子馋得口水流……

记得邮局旁有个小饭店,忘了叫什么名字,以面食为主,有一毛五一碗的炸酱面、一毛八一碗的浇肉面,还有八分钱一碗的白皮面。

那时工资低,一个月只有36块钱,轻易不敢下馆子。有时实在嘴馋,就去吃上一碗炸酱面。吃面是为了喝啤酒。那个年代物质匮乏,市场上很难买到啤酒,只有到了饭店才有啤酒卖,但有个条件,你只有买人家的饭或菜,才卖给你一碗啤酒。

我往往是花上一毛五分钱二两粮票,要碗炸酱面,再花上两毛钱要碗生啤。啤酒装在大木桶里,服务员把木桶上的龙头打开,那凉津津、起着白沫、冒着气泡的啤酒就流出来了,没等服务员把酒端上桌,口水已在嘴里打转转。先吃上一口热乎乎的面,再喝上一口凉津津的酒,顿时暑气全消,那个舒坦,至今想起来都美滋滋的。

除了小饭店,上海饭店咱也吃过,不过那是为数不多的几次,没有特殊情况是不敢去的。那里的饭虽好,可也贵。

第一次是参加工作不久,带父亲去柳北一个口腔门诊部镶牙,镶完牙后,也到饭点了,于是我领父亲来到位于钟楼街的上海饭店。父亲说,太贵了,找个小饭铺吃碗面算了。我说,咱也不天天来吃,尝尝鲜嘛。父亲拗不过我,只好跟我进了饭店。

上海饭店当时是与晋阳饭店、林香斋齐名的“太原三大饭店”之一,用今天的话说,是个高大上的地方,能在那里吃顿饭,是很有面子的事。虽然我只 有36块钱的月工资,但请父亲在上海饭店吃饭是我早就想好了的,一直没机会,这次也算是对父亲养育之恩的一种回报吧。

这是我第一次走进这家餐馆,上二楼,进了个小包房。点的什么菜已记不清,只记得给父亲打了二两散装白酒,还有小笼包。那包子真叫个好吃,皮薄馅大,卤汁饱满,鲜美可口。虽没点什么有名头的菜肴,可看得出来,父亲吃得很高兴。

第二次是在和妻子结婚登记后去的。结婚成家乃人生大事,理当庆祝一番,我和妻子从庙前街办婚姻登记处领完证出来,就直奔上海饭店而去……

后来我还和同事去过一次。没点菜,只点了包子,我们就是冲着上海饭店的小笼包去的。

虽然只是有数的几次,上海饭店已深深刻在我的记忆深处,每每想起,那白胖胖的小笼包子就在我的眼前晃来晃去,真是呼之即出,挥之不去……



儿时

玩泥巴

晓 阳

人们形容和谁的关系铁,常常会说:我们是小时候一起玩“尿泥”长大的。这对于现在玩手机长大的孩子来说,恐怕很难理解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居民为了烧火做饭取暖,常到太原东山脚下拉“烧土”,用这种土和煤面掺和起来和煤泥拍煤饼。这些烧土中有一种颜色发紫、粘性十足的土,是孩子们玩泥巴的最佳材料。用这种土和出来的泥,我们叫它“胶泥”。

和泥时,我们先把土中的小石粒拣出来,再把土坷垃捣碎,如有条件最好能用筛子筛一遍,使之成为细土,然后兑上适量的水,像和面那样反复揉搓,这样和出来的泥柔软而有韧劲。

泥和好了,我们就按照各自的喜好捏制各种物件。如能发出稚嫩而尖锐声响的泥哨,外形逼真、炮塔履带俱全的微型坦克,有鼻子有眼四肢俱全的泥人等等。当然,捏一支“二把盒子枪”,是买不起玩具枪的男孩子们的最爱。“玩打仗”时手里掂一支“盒子枪”,那感觉真叫一个酷。

除了捏制各种心仪的物件外,我们还爱玩一种叫“补锅”的游戏,就是两三个小伙伴各自和好一块大于“半头砖”的泥坨,把它捏成“平底锅”形状,找一块平地,以“石头、剪子、布”确定先后次序,将手中的“锅”底朝上、口朝下,以恰到好处的力量平行扣向地面,使“锅底”由于空气作用爆出一个窟窿,另一个小伙伴就要视窟窿的大小,拿出自己的泥巴把这个窟窿补上。谁的“锅”爆的窟窿大,谁就赢的泥巴多,但如果你摔“锅”的时候把“锅边”也摔裂了,就算输了。所以“做锅”的工艺就很讲究,和泥要和到位且软硬适度,锅的周边要薄厚均匀,锅底稍薄于锅边而不漏气。摔的时候也有讲究,手腕翻扣要迅速,用的力度要适中,特别是要让“锅口”水平着地,才能使锅里面的空气冲破锅底。

玩泥巴的过程中,有时需要加湿和泥而附近又没有水源,有的孩子就撒泡尿来和泥,“玩尿泥”的说法大概就源于此吧。

现在回想起来,无论是用泥巴控制自己喜爱的玩具,还是“补锅”的游戏,都培养了小孩子“动手”的能力和争强好胜的心性。

此刻,望着书桌上母亲的遗像,我又想起敬爱的母亲了。

1985年6月11日,我正在山纺中学高中文科班给学生们上语文课,突然接到妹妹从天津发来的加急电报:“母病危,速归。”我请了假连夜乘火车赶回天津,径直来到医院病房,妹妹悄悄告我:“母亲弥留许久,好像就是等你了。”我一下跪在母亲的床头,对着她的耳朵说:“妈,我回来了。”我似乎看到母亲在点头,抑制不住感情大声哭了起来。当晚我守候在母亲身旁,握着她瘦削的手,历历往事浮现在眼前。

母亲出生在贫苦人家,从未上过学,但凭着聪明好学,学得一手好针线,做得一手好饭菜。嫁给父亲后,一生操劳,带大了我们兄弟姐妹四个。哥哥在天津汇文中学上学时就参加了学生运动,天津一解放,他就参加解放军南下了,深明大义的 母亲为哥哥收拾好行装,含泪送走了哥哥。我家成了军属,街道每月发给生活补贴,母亲又揽下糊火柴盒的营生,虽说生活十分拮据,但仍供我们上学。1952年,我考上天津百年老校铃铛阁中学,小学四个班只考上我一个,录取名单还登在《天津日报》上。母亲喜极而泣,奔走相告,还特意做了我最爱吃的烙饼炒鸡蛋。上初



深深的怀念

李汝骥

中了,母亲为我缝制了一件蓝布中山服,我一直穿到高中毕业,六年间缝缝补补,几次加长,坐在我座位后的同学笑着对我说:“看见你衣服上密密麻麻的针线眼儿,我直眼晕。”

1973年,我得了肺结核,从太原回到天津父母家养病。父亲说:“对这种慢性病要三分治,七分养。”母亲说:“你不用害怕,对疾病,治疗不可少,健康饮食不可少,身体锻炼不可少,快乐心情更不能少。”在父母精心调养下,我的病很快治好,告别双亲时,看到父母双鬓白发,我落泪了。返回太原后,我重新登上高中语文课讲台,牢记着母亲的教导:“你要好好教书!”

1985年6月13日,我回到天津第二天母亲就去世了,我们兄弟姐妹悲痛至极,料理完丧事,我怀着无限思念母亲的心情回到太原。从此我的书桌上多了一张母亲的遗像,每当抬头看到母亲慈爱的面容时,我就增加了努力工作学习的动力。第二年我教的文科班语文高考成绩在全市名列前茅,学校发给了我一笔不菲的奖金,我寄给了妹妹,我们共同置办了一块墓地,让父母合葬,我也曾回天津祭奠扫墓。

如今母亲离开我们36年了,但那些往事时刻温暖着我们的心灵,激励着我们向真诚、善良、勤俭、高尚的境界迈进。母亲永远活在我的心中。